

怎样采访新闻

孙世恺

北京出版社

前 言

采访是新闻工作的基础，又是新闻写作的前提。也可以说，新闻采访是一种“时代的科学，时代的艺术”。

道理很简单。没有新闻采访，就无法办报纸和通讯社，也无法办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掌握采访的本领，在现实生活的汪洋大海里很难捕捉住新闻，更谈不到用文字或音象把它表达出来，忠实地报告给广大读者、听众、观众。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采访是以新闻报道工作为己任的记者（通讯员）的一项基本功。

北京出版社1987年出版了拙作《怎样写新闻报道》一书。从采访与写作的关系来说，本书是它的姊妹篇。

我作为新闻战线上的普通一兵，在党的培育和前辈的关怀指导下，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多年了。对新闻采访这项基本功，自己虽然没有练好、掌握好，却积累了一些心得体会，也获得不少的教训。近十年来，应邀到中国新闻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中国记协新闻学院、四川新闻管理干部学院（现改为中国新闻学院进修部二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贵州新闻干部进修班等单位和一些报社，讲授新闻采访学。这本小册子就是在讲这门课程的基础上陆续写出来的。

新闻采访学是政治性、实践性和综合性都很强的一门学

问。我对它的学习和研究很不够。因此，这本拙作对新闻采访的基本规律、工作原则和活动方式方法等课题进行的一些阐述和探讨，难免有不少愚见和谬误，望读者指正。

这里还要说明一点。在撰写本书的一些篇章时，还吸取不少新闻学研究者、新闻教学工作者和新闻记者对采访方面提出的一些新见解、新经验。在此向这些同志深表谢意。

作 者

1987年“国庆”节前夕

目 录

采访的作用在哪里·····	(1)
新闻采访的基本任务是什么·····	(9)
新闻采访的路子要走正·····	(17)
要重视采访前的准备·····	(27)
做新闻信息灵通人士·····	(36)
努力建立新闻信息网·····	(43)
善结智囊人物·····	(48)
发现新闻靠什么·····	(54)
多抓“鲜活货”·····	(64)
怎样抓问题·····	(70)
要会“挖”新闻·····	(76)
选择报道题材要准·····	(81)
实地观察好处多·····	(89)
如何用眼睛观察·····	(103)
观察的方式有哪些·····	(111)
到现场观察什么·····	(114)
“知而后能采”·····	(120)
要同什么人都谈得来·····	(125)
寻找接近访问对象的“由头”·····	(131)
掌握“问”的艺术·····	(139)

访问应选择时机和环境·····	(144)
记者调查研究的特点·····	(150)
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及其他·····	(154)
调查研究应坚持的原则·····	(166)
采访活动需要的“桥”和“船”·····	(172)
采访记录有“学问”·····	(197)
新闻采访要有储备·····	(204)
从“蒋子龙恋工厂”谈起·····	(225)
采访切忌强加于人·····	(229)
采访的态度与作风·····	(234)
新闻采访应有法制观念和道德规范·····	(240)
附 录:	
内山完造在鲁迅博物馆·····	(244)
访鲁迅在北京住过的地方·····	(249)
将艺术献给人民的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	(258)
名导演焦菊隐谈《虎符》·····	(265)

采访的作用在哪里

谈起新闻采访的作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是新闻工作的基础，也是新闻写作的前提。所以，中外新闻工作者都十分重视采访。我国新闻史上声名显赫的报人邵飘萍认为，报纸有三项业务，即采访、编辑、经营，而以采访最为重要。因为构成一张报纸的最重要原料是新闻，而新闻之取得乃在采访。可以说，这是他从新闻工作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

建国时曾任新华社总编辑和社长的陈克寒同志，在抗日战争年代写过《献给敌后的青年记者》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对采访与写作的关系讲得十分清楚。他说：“几年以来，大家都在怨恨一件事，便是我们新闻通讯的一般化，并在写作上挖尽心机来加以补救。这种努力是真诚的，可敬的，然而这仅仅是写作上的问题吗？从一般原理说来，是内容决定形式，那么从新闻观点上出发，便应该是采访决定写作。”新闻界前辈穆青同志谈到记者工作时也讲过这样的话：“写作固然是重要问题，但同采访比起来，后者是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手里没有好的素材，文字再考究，也弄不出好东西。”他还补充一句：“如果我们的新闻改革不是从怎样取材这个前提着手，而仅仅把功夫用在文字加工上，那就没有改在要害之处。”这个意见把采访与写作的关系说得更加明确了，也颇有现实意义。这些新闻界前辈的论述，都说明采访是从

事新闻报道的第一位工作，也是当好记者的一项基本功，因此，要写好新闻报道，必须首先在采访上下功夫。

可是，有的记者往往不重视这一点，把主要精力用在文字加工上，或者说把功夫都用在写作上，却忽视采访。于是便出现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一篇稿件只采访几个小时或一两天，写作和修改却用了三四天或五六天。由于采访不下功夫，对事物了解的不深不透，写作和修改花费的时间再多，也不一定能写出好的报道来。我当记者就吃过这个苦头。那是1952年的冬天，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访问苏联回来，到他的家乡山西省长治地区几个县向当地农民介绍苏联当时在斯大林领导下农业发展的情况。我从北京去采访，正赶上他在一个县的群众大会上作报告。当时，我只是看了看会场上的气氛和群众的情绪，听了一阵李顺达介绍苏联农业组织和生产的情况，又翻看了一些材料。采访还没用半天时间，便坐在县委的招待所里写起稿子来，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赶写出一篇2000多字的通讯。稿子发到编辑部，编辑同志看我只写了些李顺达怎么说，听报告的人如何鼓掌，会场上的气氛又怎样热烈，等等，里面没有多少具体而典型的事实，空话、废话连篇，编辑部自然是无法采用。我那次报道为什么失败呢？关键是没有在采访上下功夫。当时，我既没有深入访问李顺达同志和听李顺达报告的一些农民和农村干部，也没有了解当地的农业组织、生产的情况，以及李顺达报告后产生什么影响和作用，等等。只是“走马观花”式的到报告会场看看、听听，抓到一鳞半爪的现象，坐在屋子里就写稿子。俗语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回顾那次采访深深感到，作为一名记者，即使是个“巧妇”，如果不重视采

访，手中不掌握丰富的素材，缺少具有说服力的典型事实，不论自己有一支什么样的“妙笔”，也难手下“生花”。这样说，并非轻视写作，更不是主张对写作可以不下功夫，马马虎虎写稿子。毫无疑问，认真写作对于新闻报道的表达是十分重要的。写作不过硬，即使采访深入了，掌握新闻素材虽然丰富，也难产生精彩的新闻报道。

问题在于，从新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来看，采访与写作两者相比，正如穆青同志所说的，采访比写作更为重要。要搞好新闻报道，作为记者必须摆正采与写的关系。只有重视采访，不断地改进采访工作，才能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因此，对采访应有如下一些基本认识。

其一，能不能及时地发现新闻，决定于采访。

按照陆定一同志给新闻下的定义：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以这个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明，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也就是说，先有事实，后有新闻。客观的事实是不断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现实生活又是丰富多采的，尤其是我们国家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的新时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各条战线各个方面，不断涌现出新情况、新事物、新人物、新经验、新问题、新观点、新思维……这些“新”都可能产生新闻。可以说，这正是新闻记者大有作为的时代。在我国到处都有又鲜又活的新闻，要及时地发现它，只有通过采访这个手段。这里顺手举一例。在各地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时，常听到一些青年人说：“天天讲共产主义，可这共产主义究竟在哪儿？我们承认，的确有雷锋、王杰式的共产主义战士。可是，这样的人物在全国也数得过来，我

们周围有吗？”针对这种思想认识，有的记者早想从正面写点报道，就是苦于找不到好的新闻线索。可是，有个记者在北京市土桥砖瓦厂采访，却发现了这样一件新事：这个厂各车间团支部活动室的墙上，都挂着一个笔记本，名为“共产主义闪光点登记簿”。从1980年3月开始，这个厂的团总支以及各车间团支部发动团员、青年，把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带有共产主义因素的好人好事及时记录下来。各车间挂出这个登记簿的当月，全厂就记录好人好事90几件。6个月后，所记录的好事总数达520多件，共有577人次。这个厂还及时利用广播、黑板报、交流会等形式，广泛宣传记录在“共产主义闪光点登记簿”上的好人好事，针对一些青年工人存在着“共产主义究竟在哪儿”的思想，以本厂本车间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发生的带有共产主义因素的活生生事实，向广大职工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而且这种思想教育的形式又生动活泼，颇有吸引力。于是，那个记者把采访中发现的这个新事物及时写成了报道，《人民日报》在1983年10月11日一版加花边刊登出来。象这类有意义的新鲜事，记者不深入现场采访就不易发现。所以说，要及时发现真正“新”的新闻，决定于采访。

其二，能不能把新闻报道写得充实、精彩，也决定于采访。

众所周知，新闻报道要言之有物，不说空话、废话，依靠具有真凭实据的事实去宣传群众，引导社会舆论。那么，新闻报道需要的事实从哪里来？除了有关部门、有关单位送来的工作总结、工作简报等材料之外，主要是靠记者采访得来的。即使写稿件时使用一些工作总结、工作简报等材料，

也需要记者去采访补充和核实。尤其是要把新闻报道写得充实、精彩,更要求记者在采访上下功夫才成。不然,只是坐在办公室就一些书面材料编编改改,是写不出好新闻的。被评为1981年全国好新闻的《明知故犯吃特殊饭》便是一例。这条新闻是报道北京市丰泽园饭庄一个青年厨师揭发北京市第一服务局五讲四美检查组人员吃特殊饭的不正之风。新闻中把这个检查组一行11人在丰泽园饭庄吃的13个菜的菜目一一列出来,又写出他们吃的主食粽子、银丝卷和米饭等。据饭庄管业务的同志计算,共值35元5角4分。有经验的老师傅说,这顿饭三四十元买不下来。记者查看了丰泽园饭庄这次“工作饭”的帐单,记下了五讲四美检查组工作饭10人(共交)2元5角、粮(票)2000克。饭庄职工反映说:名曰“五讲四美”检查组,实际上是“大吃大喝”组。……这条新闻没有一句空话、废话,把那个“大吃大喝”组人员吃的琳琅满目的菜肴和各种尺寸的菜盘都写得跃然纸上,十分尖锐。读者看到这样的批评性报道怎能不信服呢!记者如果不深入采访,无法写出如此充实、有力的新闻。许多记者的实践也都说明,要写好新闻必须下功夫采访的道理。不采访或者采访不深入,不掌握富有说服力的典型事实,只靠文字“做文章”,绝不会写出好新闻的。

其三,能不能使新闻报道做到真实、准确,同采访的关系极大。

报道是否真实、准确,直接影响到我们无产阶级新闻的生命,这本是新闻界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早在1945年3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就以《新闻必须完全真实》为题发表了社论。社论指出:“如果我们的报道是实事求是的,把真

正好的说成好的，真正坏的说成坏的，有一分说一分，有两分说两分，那末读报的人就不会在工作中走错路。反之，如果我们的报道错误，把坏的说成好的，好的说成坏的，或者报道有了夸大，把一分说成两分，八分说成十分，那末读报的人就会在工作中走错路，有时甚至发生很坏的影响，影响到某项工作，也影响到报纸的威信。由此看来，求得新闻的完全真实，对于我们是何等重要。”建国以来，不少新闻单位为了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准确，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建立了消灭新闻报道中产生各种差错的责任制度和奖惩制度，这都是必要的。但是，要从根本上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准确，其责任不完全在报社、电台、电视台和通讯社的编辑部，而是记者在采访中就应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要消灭新闻报道中的失实、浮夸等差错，必须从采访抓起，这才是“治本”的办法。因为，新闻报道中发生的错误，多是在采访时产生的。比如，有一条新闻报道甘肃的天祝藏族自治州将举行全区赛马大会。记者采访这条新闻时，只从这个自治区的一个会议记录本上，看到赛马大会举行的时间，记录上只写了月、日，却没有注明是农历还是公历。于是，记者凭主观判断，把这个日期作为公历写到新闻里，其实会议记录本上记的日期是农历。看起来，这个错误只是一个日期问题，可是产生的影响却很坏。甘肃省有关部门按照新闻报道的日期派干部去天祝参加大会，准备表示祝贺；外地不少流动商贩也按报道的日期赶去了，准备趁着赛马大会的时机做生意，结果都扑空了。因为公历和农历相差一个月左右！新闻中发生这类失实的差错，编辑部在处理稿件时就很难发现，编辑一般也不会想到记者把农历的日期误认为公历写到新闻

中去。实践说明，新闻报道出现的许多失实、浮夸等错误，究其原因，绝大部分是记者采访时粗枝大叶，或主观行事，或偏听偏信等造成的。所以，新闻报道要做到真实、准确，记者必须在采访时抱着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还要树立一丝不苟的作风，坚决反对马马虎虎、遇事不求甚解的粗枝大叶作风。只有如此，才能从采访这个根本环节上，消灭掉报道中的失实等错误，使新闻报道的完全真实得到保证。

其四，能不能尽快发出新闻，同采访又有很大的关系。

新闻报道要做到迅速及时，固然需有过硬的“笔头”，要有“倚马可待”的本领。但是它同如何采访也是颇有关系的。一些训练有素的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就努力做到以下两点：

一是边采集材料边选择材料。一篇稿件需要什么样的材料，不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在采访过程中就做到有取有舍，避免了采访的盲目性，自然就提高了采访效率，为尽快写出稿子打下一个好基础。

二是边采访边构思。采访一结束，稿件组织结构也构思成熟了，铺开稿纸便可一气呵成。新闻界一位前辈讲起一次采访，很能说明这一点。那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在朝鲜的板门店举行谈判。有的外国进步记者同我们记者一起采访。人家等谈判会议一结束，就打好了腹稿，立即用打字机打出稿件，很快把新闻发出了。可是，我们有的记者回到住地，翻开采访本和一堆材料，东选西摘，然后再琢磨怎么写法，好半天也写不成一篇稿件，这又怎能尽快发出新闻呢？

由此可见，采访中如能做到上述两点，对尽快发出新闻

不是也起决定性的作用吗！

仅从上述四个方面，便可看出采访对写好新闻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了。因此，从事新闻报道的同志，必须重视采访，加强采访，还要不断地改进采访工作，才能写出更多更好的新闻报道来。

新闻采访的基本任务是什么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应先明确一下：什么叫新闻采访？对于这个命题，在我国新闻界和新闻教学中有种种讲法。有的认为，新闻采访是为进行新闻报道而从事的调查研究活动；有的说，新闻采访是记者通过一定的方式或手段获得新闻事实的一种活动；有的又讲，采访是代表无法出面的读者，用调查研究（主要是谈话、观察）的方法去获得新闻。我们把它概括为一句话：所谓新闻采访，就是采集、寻访新闻的活动。从这个定义出发，确定采访的基本任务是：寻找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

谈到新闻采访的基本任务，用美国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话说，就是寻找事实。我在“事实”的前面又加上“具有新闻价值”六个字。也就是说，新闻采访的基本任务，是寻找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这种提法可使新闻采访的目的性更明确些。因为，不少工作岗位的人，都有一个寻找事实的任务。比如，党政领导机关一些干部，下去调查了解党的方针政策贯彻执行的情况，也得寻找事实，这是从实际中研究问题必须做到的一步。公、检、法部门的人员也到下边去寻找事实，这是为了侦破或审判案件掌握必要的根据。作家下厂下乡体验生活也是寻找事实，这是为了从事创作去熟悉生活

中的原型……所以说，各种工作岗位的人有时都需要去寻找事实，却各有各的目的。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记者进行采访虽然也是寻找事实，但并不是随便找到什么样的事实都能完成采访任务的，只有寻找到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才能写成新闻报道。这里所说的新闻价值，是指事实本身具有宣传报道的意义、作用等含义。

作为采访的基本任务，在寻找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时，还需明确以下四点：

第一点，寻找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是有立场的，是在一定的报道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从表面来看，无产阶级记者和资产阶级记者的采访，都是寻找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举例来说，新华社和首都各报的记者在北京采访，是寻找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外国常驻北京的一百多名记者，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他们在北京采访也是寻找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问题在于，对同一个事实的新闻价值却有不同的看法。比如，1978年底和1979年初，北京出现所谓“西单墙”事件。当时美联社、法新社等资产阶级通讯社的记者从那里寻找到一张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字报，便觉得很有“新闻价值”，如获至宝一样抢着去报道。而我们新华社的记者看到这样的大字报，却认为它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毫无公开宣传的新闻价值，根本不去报道它。关于这个问题，用我国大学讲授新闻采访学的教师的话来说：“记者在进行采访时，总是受一定的世界观、立场和观点支配的。他为什么报道这个事实，不报道那个事实，一般情况下都受其世界观制约。”这种世界观的制约，在新闻采访实践中体现在报道思想里，也

就是说，采访时寻找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是在一定的报道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这种报道思想，有时比较具体，有时也可能比较原则。但是，一个记者的采访活动，不能脱离一定的报道思想，随心所欲地去寻找事实。

在这里还必须说明一点，前面讲到采访时寻找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是有立场的。它主要寓于报道思想之中。至于说注意事实本身的政治性，这是对绝大多数采访内容而言，并非每次采访都如此。陆定一同志1957年9月在新华社建社2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时说过：“新闻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关于自然现象的，一种是关于社会现象的。关于自然现象的消息，例如，牛听了音乐会多产牛奶，什么地方出了奇怪的鸟兽，自然科学有了什么新的发明等等，这里没有什么政治因素。但是，关于社会现象的消息，就不同了，这里就有政治问题……。”陆定一同志这段论述，说明了采访时寻找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关于社会现象是有政治性的，但是对于自然现象和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等就不尽然了。资产阶级记者采访时寻找它，无产阶级记者采访时也去寻找它，这并不是说没有立场问题。比如，前些年，美国研制的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和“挑战者”号试飞成功及其飞行中取得的科学实验成就，西方记者进行大量采访，并大肆吹嘘美国这一科研成就。新华社驻华盛顿的记者也去采访，只对它进行客观地报道，不加任何评论，这也表明了我们的立场。不论是哪个国家、哪种社会制度，只要取得对人类有贡献的科研成就，或新发现有意义的自然现象，我们都可以去采访，不搞十年动乱时期“左”的那一套，把什么采访内容都打上阶级的烙印。但是，对资产阶级包括其他剥削阶级的东西决不去胡吹

乱捧，更不能猎奇，迎合某些人的低级趣味。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新时期，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采访时加以注意。

第二点，寻找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要做到客观真实，切忌主观片面，更不能弄虚作假。

在采访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地了解和掌握客观实际情况，这是无产阶级记者必须遵守的一项重要职责。刘少奇同志1956年对新华社工作作指示时曾说过：“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场，那么，我们的报道就要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他又说：“新闻就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我们在采访时如何做到这一步，埃德加·斯诺讲过一个意见很可借鉴。他说：“在掌握事实之前，不可先有定论，而要先寻找事实。具备了足够的事实就水到渠成，有可能说明问题的真相。”斯诺在这里提出采访“不可先有定论”这一点十分重要。换句话说，采访时先有定论，势必抱着“成见”或“偏见”去寻找事实，容易犯主观片面的毛病。埃德加·斯诺1936年到陕北采访时便不是这样。当时，他去陕北之前“没有定论”，到解放区后访晤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又到甘肃和宁夏前线采访部队指战员和当地居民，寻找到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足足记了16本之多。他从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看法，写出了大批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报道。先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英国的《每日先驱报》和美国的《星期六评论报》及《生活》等报刊上发表，然后汇编成《西行漫记》一书，如实地报道了我们党的主张以及陕甘宁边区军民坚决抵抗侵略